

● 总主编 傅金铎 张连月

中国政党

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期的 中国共产党

本卷主编 刘建军
尹小满

华文出版社

中国政党

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期的 **中国共产党**

主编 刘建军 尹小满
副主编 蒲跃 郭文明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政党/傅金铎,张连月主编,—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2.8

ISBN 7 - 5075 - 1219 - 3

I . 中… II . ①傅… ②张… III . 政党—研究—中国
IV . D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1829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http://WWW.hwcbs.com>

电子信箱:webmaster @ hwcbs.com

电话(010)83086853 (010)83086663

新华书店经销

赞皇县胶印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08 印张 3000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全套(10 卷)定价:280.00 元

《中国政党》编委会

顾问 周逸 郭德宏 吴仁彭
邵维正 萧贵玉 范香保
孟繁彪 靳丰龄

总主编 傅金铎 张连月

副总主编 王金池 张宗豪 王玉琮
郭艳梅 冯学工 赵振发

编委 丁万明 马捧娥 尹小满
王双印 王玉琮 王行道
王金池 冯学工 刘建军
祁刚利 同社喜 宋志宏
张连月 张宗豪 张海霞
张颖 李芬 李英成
郑宪 侯尚文 姚振寰
胡洪宝 赵振发 郭文明
郭建民 郭艳梅 常瑞平
傅国钧 傅金铎 路笃盛
黎玉林 魏先法

《中国政党》作者名单

丁万明	丁万英	万国庆	门铁良	马捧娥	马熙群
孔令春	尹小满	方翠英	牛 宏	王 健	王双印
王天旺	王玉琮	王行道	王金池	王树臣	王根起
王海宁	王冀川	王燕霞	冯学工	冯振海	刘双牛
刘玉香	刘江茹	刘志强	刘建军	刘惠荣	刘景臣
刘瑞芬	印素萍	孙大为	祁刚利	许 涛	闫社喜
严志海	何洪澜	何艳杰	吴洪江	宋志宏	宋桂英
张 红	张丽云	张连月	张国强	张宗豪	张宝凤
张星庭	张洪钧	张海霞	张瑞琨	张聪杰	李 芬
李志强	李秀丽	李国芳	李国珍	李英成	李金辉
李海红	李淑珍	李彦玲	李福澜	李翠艳	杜明庭
杜海清	杨云飞	杨建华	杨首茹	肖 波	迟兴爽
陈育青	陈金荣	陈胜利	孟昭安	岳 璞	岳银全
罗幼娟	范二奎	郑 宪	侯云霞	侯尚文	姚振寰
娄广田	胡洪宝	赵 波	赵建强	赵振发	郝 峰
姬军霞	徐将林	耿连兵	袁树平	贾丽云	郭文明
郭建民	郭艳梅	郭培芬	高 娟	高夕果	高彦宏
高景龙	崔立英	崔彦文	常瑞平	梁占魁	梁军峰
梁晓前	黄玉萍	傅君莉	傅国钧	傅金铎	彭开信
景 枫	焦友生	童广俊	谢英芬	韩 芳	韩立红
窦海荣	蒲 跃	解军先	解其斌	路笃盛	靳伯云
端木捷	黎玉林	魏先法			

序 言

华 毅

政党是现代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除少数国家没有政党或禁止政党存在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政党活动来推动国家政治生活运行。社会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各自的政治制度不同，但几乎都存在政党和政党制度。因此，政党研究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党》是一部系统介绍和研究政党问题的专著。这本书的特点，正如编著者所说，一是对我国政党的产生发展、兴衰演变作出客观的分析；二是力求反映新的研究动态，吸纳新的研究成果；三是扩大知识容量，把政党、政党发展、政党理论等方面的知识尽量包容进来；四是力求方便运用。我通读了这本书，认为这些目的已经基本达到。

从辛亥革命算起，我国政党已有近百年历史，历史较久，范围广阔，经验丰富，教训深刻。对中国政党基本上可分为四块来研究：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建设；二、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和变迁；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四、港、澳、台的政党研究，香港在英国统治期间没有政党，现在有了；台湾在国民党蒋氏父子统治时期实行一党制，现在政党林立，国民党从执政党变为在野党，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是经过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已载入我国宪法。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使之在我国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是政党研究的一个重点。这项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多党制，也不同于一党制，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基本特点，这就是：一、各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又同共产党互相监督。这同西方国家的多党轮流执政体制是根本不同的。二、各民主党派已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它们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三、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它们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各政党没有在朝在野之分，不是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关系。四、政治协商是多党合作的重要方式。五、各民主党派都有自己的社会基础，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中一部分人的合法利益，反映它们的要求和意见。在原来的阶级基础发生变化之后，各民主党派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联盟。六、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民主、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

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目标。对于挫败西方多党制对我国的渗透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和西方多党制是两种不同的政党体制。西方多党制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表现形式，它与封建专制比是一大进步，在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给人民选择这个政党和那个政党的民主权利，但就其实质说，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的。同时，多党制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各派政治力量竞争，平稳交接政权，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稳定的一项重要制度。多党制从它产生起，就带来不可克服的弊病，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就说过：“一个派别对另一派别的交替统治，由于党派纷争所产生的天然报复心理而使斗争愈演愈烈，在不同的国家中，这种交替统治干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孙中山最初曾赞扬英美的政党制，认为“一国之政治，必须有竞争，始有进步”。在民国初年，也学过西方的议会、政党制度，立国会，建政党，当时的政党政团多达300多个，成为政党林立的时代，结果如何呢？在北洋军阀的操纵下，各政党争权夺利，被拉拢收买，出现贿选丑闻，搞得乌烟瘴气，臭不可闻。孙中山痛心地说：“现在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各国实行这种代议政体就免不了流弊，不过流传到中国，流弊就更不堪问罢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西方多党制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依据中国的国情，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才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

今年适逢党的十六大召开，本书的出版可谓是参加编著的有关单位和同志献出的一份礼物，也是对我国政党以及与政党紧密相连的政党制度研究更全面、更深入发展的推动，特以为序。

• 目 录 •

- 序 言 华 毅(1)
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1)

导 论

专 题

-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4)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7)
三、拨乱反正 (11)
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 (15)
五、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18)
六、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 (21)
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25)
八、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 (29)
九、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36)
十、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37)

开始全面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42)

导 论

专 题

- 一、中共十二大 (45)
二、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49)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53)

四、中共十三大	(57)
五、治理整顿	(61)
六、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65)
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68)
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形成	(74)
九、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	(80)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	(84)

导 论

专题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	(90)
二、中共十四大	(92)
三、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	(96)
四、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	(99)
五、江泽民论十二大关系	(103)
六、“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108)
七、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	(112)
八、香港回归祖国	(116)
九、中共十五大	(121)
十、三峡工程大江截流	(124)
十一、《邓小平文选》三卷出版	(127)
十二、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	(129)
十三、江泽民提出和平统一祖国八项主张	(131)
十四、反腐败斗争	(133)
十五、京九铁路建成	(135)
十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138)
十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确立	(144)
十八、跨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48)

十九、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54)
二十、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165)
二十一、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169)
二十二、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174)
二十三、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178)
二十四、中国共产党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理论 及实践	(197)
二十五、中国共产党与各国政党交往的现状	(204)
二十六、中国共产党新型党际关系理论提出后 面临的形势	(206)



一、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简表	(209)
二、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代表会议简况	(210)
编 后	(216)

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之一

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 中国共产党

导 论

以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进行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第二次革命，大力探索并胜利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82 年 9 月，是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党完成了艰巨的拨乱反正任务，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迈出了步伐。

1976 年 10 月，江青集团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国际上，世界局势相对稳定，现代科学技术 20 年来有了很大发展，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及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增长特别迅速。据世界银行 1977

年统计，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竟排在第 117 个国家和地区之后，属于贫穷国家行列。就国内形势看，粉碎“四人帮”时，整个政治生活还比较混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文化大革命”遗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党面临着新的抉择。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虽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没有胆识和魄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因而，他继续坚持“左”的指导思想。加之“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不易在短期内消除的客观情况，党的工作出现了两年徘徊的局面。在政治上，华国锋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路线，拖延和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平反，极大地阻碍了各方面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在经济建设上，在国民经济开始摆脱瘫痪、半瘫痪的同时，又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两年间“左”倾指导思想的继续，在党内外群众思想中引起新的混乱，也遭到党内外群众不同程度的抵制。全党上下的这种不满与抗议，集中地表现在 1978 年 5 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上。通过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全党的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这对于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巨大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会上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

代领导集体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承担起艰巨的历史使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此后，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在经济建设上拨乱反正。与此同时，认真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并很快向其它领域发展。

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保证了拨乱反正的正确方向和顺利进行。

1981年6月，在认真清理了重大历史是非，落实了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政策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次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

党在这个时期的主要经验是：

第一，必须坚定地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第三，必须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科学评价党的领袖，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历史，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领袖，全面总结党的经验教训，从而分清是非，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才能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才能维护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专题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8年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人们热烈地欢庆胜利，企盼社会主义建设“第二个春天”的到来。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束缚，许多人还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所犯的错误，还不能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摆脱出来。因此，党的事业出现了在前进中徘徊的局面。当时主持党中央领导工作的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也认识到要发展经济。然而，他不但不清理长期以来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而且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方针。“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恢复工作的问题，是粉碎“四人帮”后一个时期的政治焦点，党内外干部群众纷纷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

件”和邓小平平反，并得到许多领导人的支持。而华国锋却加以拖延和阻挠。1977年2月，“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经华国锋批准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正式概括提出了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继续强调“两个凡是”的思想，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他似乎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维护毛泽东的威望，而实质上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全盘继承和延续下来，其直接的政治用意是阻止邓小平复出工作，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竭力维护“左”的错误，继续推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显然，这样下去的确有回到“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两个凡是”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违反历史潮流的，理所当然地受到党内许多领导人的反对与抵制。邓小平率先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在尚未恢复工作的1977年4月10日，就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负责人谈话中，明确批评“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不赞成“两个凡是”，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工作。他在这次会上再次着重谈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针对会上仍有人大讲“两个凡是”，他强调指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这是针对“两个凡是”这个唯心主义

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原则而提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

1977年12月，中央党校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和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组织中高级干部学员研究、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胡耀邦提出了应该遵守的两条原则，一条是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一条是要把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提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4月上旬，当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正准备撰写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时，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已撰写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标准》的文章。文章经《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及理论界共同研讨讨论，最后由胡耀邦审定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登。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形式公开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接着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相继转载。这篇文章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观点，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化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全党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但华国锋和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却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加以压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汪东兴在不少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